

第二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董灏智

2014年8月24—25日,第二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协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期间,来自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30余名学者,承继第一届研讨会的问题意识,围绕着“东亚秩序之理念与构造”和“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两大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兹将会议所探讨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东亚秩序与中国疆域的建构 在19世纪中期“西方近代文明”的军事冲击之前,“前近代”东亚地区曾长期存在过某种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共同体”形态。对此,学者们有“册封体制”(西岛定生)、“宗藩体制”(张存武、张海鹏)、“朝贡贸易体制”(滨下武志)、“华夷秩序”(费正清、信夫清三郎、何芳川)、“天朝礼治体系”(黄枝连)、“前近代东亚体系”(韩东育)等不同称谓。然而,由于这一区域形态的复杂性,难以单纯地从某个视角一言以蔽之,因此,中性的“前近代东亚体系”的表述似乎更为客观、更为综合和更接近事实。

前近代东亚秩序的形成、演变及其特性,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研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从起源、性质、应用范围、运行模式、经贸关系、文化认同、目前现状以及对当今政治格局的影响等方面,比较了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的重要差异,认为东亚的宗藩体系与西方的殖民体系有本质的不同,且扮演着不同角色,前者是东亚国家的“稳定器”,后者则导致了近代世界的纷争与战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强调应打破一国史观的束缚,从多视角、多层面研究东亚秩序,尤其是从朝鲜、日本、越南等中国王朝属国切入,考察它们对华夷秩序的认识,方能使东亚秩序的相关研究更加完整。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从“文明生态”的视角观察“东亚秩序”的特性,认为“华夷秩序”维系了两千余年东亚稳定的事实,证明了前近代东亚地区生态所需之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有效性。但是,当维持和谐生态的“纽带”和“落差”不复成立,区域内部的震荡和冲突便极易发生,直到一个新的“落差—稳定”结构出现时为止。清华大学汪晖从大陆与海洋的双重视域入手,对东亚传统秩序进行了解读,并对当代“亚洲新秩序”提出了新思考,认为亚洲新秩序的建构需要区域整合并突破民族主义的束缚,从多层次、多方位加强区域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山东大学陈尚胜认为“封贡体系”的研究需要从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两个方面考察。因为封贡体系既给东亚诸国提供了合作机制,又是鸦片战争后琉球、朝鲜、越南应对西方国家入侵的主要外交途径。

东亚秩序并不仅局限于中国王朝与朝鲜、日本、越南之间,还应包括中国王朝与东北、西北甚至西南等内陆邻国之间的关联。因而,东亚秩序与中国边疆学的结合,亦构成了本次研讨会的特色。由于中国历代王朝边疆的范围不同,故从东亚视域考察中国王朝对周边内陆属国的统合方式、羁縻方法及指导思想,便不可一概而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探讨了东亚“天下”传统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指出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在建构政权过程中的碰撞、融合、重组,主导着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和发展趋势。近代之后,因西方势力的介入和民族国家理论的传入,促使了东亚传统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台湾中研院张启雄认为,中国王朝把儒家人伦之道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应用至处理周边各国的关系上,此即“五伦国际关系”。从汉唐的和亲史来看,中国王朝采取“和亲”方式的目的与背景虽不尽相同,但这一方式进一步验证了“夫妇伦”的伦理典范对维持天下秩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东方传统国际关系的一个典型特色。

关于清朝构建大一统帝国的理论支撑及其对边疆藩部的管理方式也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内容。东北师范大学刘晓东指出,清代“大一统”理念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尊王攘夷”的“大一统”,而是基于“中外一体”“华夷一家”基础上的“夷夏协同”的“大一统”。在新的“大一统”理念与格局下,“法明”以抚内地行省,“崇满”以安边疆藩部,彼此的冲突性由此减弱并实现了“内”与“外”的有效连接。对于“边疆藩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指出,蒙古、新疆、西藏等藩部地区纳入清朝版图后,清政府对待藩部地区的治理方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以联姻、封爵等礼制为主,一是以军府、封禁等法制为辅,恩威并施,有效地管控了藩部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宋培军则以左哈萨克部与清廷关系为例,考察了《嘉庆重修一统志》有关“新疆统部”与“新疆藩部”的论述,认为清末民初的“藩部地方化”便不可被简单地归诸“州县化”一途,这样才能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疆域重新整合的种种困局。

二、东亚朝贡体制研究 朝贡体制是前近代东亚秩序的特征之一,对它的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与会者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解读东亚诸国间的朝贡体制,体现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特色。

中山大学滨下武志以琉球的朝贡贸易和朝鲜海关的建立为切入点,从经济史的视角研究东亚的“朝贡”贸易特征,指出东亚的朝贡问题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对朝贡问题的研究需打破学科壁垒,从历史事实与史料入手,凸显出东亚“朝贡”圈域的动态性与多样性,从而将东亚区域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相对化。

朝鲜对中国王朝的朝贡,在前近代东亚世界中最具典型意义。东北师范大学习书仁以“朝鲜使臣赴明的白银私贸活动”为核心,探讨了16世纪朝、日、明之间北行路线的贸易网络。这种贸易网络,对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30年代东亚地区对马贸易商圈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鲁东大学黄修志以朝鲜光海君与明朝间的“书籍辩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朝鲜在朝贡体制下对倭乱与胡乱的不同处理。与前两篇不同,东北师范大学苗威指出,研究者应在全景式了然东亚格局的情形下,对箕氏朝鲜等东亚范畴内的古史做近焦处理,突破民族国家的界线。在东亚的视野下,箕氏朝鲜的历史既体现了当地人自己的活动,也与中原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还凸显了朝鲜半岛与其他政权或民族交流融汇的轨迹。

琉球对中国王朝的朝贡,是东亚朝贡体制中的重要一环。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指出,中国明清时期对琉球的册封将中国先进的文化传播到琉球,促进了琉球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重要的是,中国在册封琉球的过程中留有大量的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和中琉疆域划分的文献资料,这些中国使者出使琉球的言录,可明证钓鱼岛不在琉球境内,尤其是流传至今的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之琉

球三十六岛地图,其作为认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隶属于中国的文献依据,为今天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提供了有力的文献证据。浙江大学尤淑君以琉球为中心,探讨了琉球入贡与传统华夷观的影响,并以中日两属与明清易代为例,分析琉球在中日之间的内在需求与外在压力,进而勾勒出琉球王国多重认同意识的形成经纬。在作者看来,琉球在明清时期三方势力间的博弈下,对宗主国认同是多重的。只有从各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朝贡体制下东亚各国之主体性与差异性。

除了东亚朝贡体制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外,对国外研究现状的介绍亦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中山大学李婉璐以哈佛学派史家卫思韩(John E. Wills Jr.)和司马富(Richard J. Smith)为核心,探讨了费正清、柯文之后美国哈佛学派对朝贡体系的研究,指出卫思韩和司马富不止在突破旧有理论范式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还体现了美国学界对中国史研究的专题化和精细化特征,值得中国学者借鉴。越南学者丁进孝介绍了百余年来越南学者对中越朝贡关系的研究状况,指出越南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中越朝贡关系的产生原因、形成与发展、性质和作用以及与其他国家朝贡关系的比较等四个方面。

三、东亚近代性与思想研究 前近代东亚秩序在近代的解体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方势力的军事侵略(外因)和东亚秩序中的自解体因素(内因)则是这一秩序解体的主要原因。然而,东亚诸国在这一秩序解体的过程中也同时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这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中皆有不同的显现。

山东师范大学李云泉以“外交”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为核心,考察了东亚秩序在近代的转型,指出近代“外交”一词在东亚的缘起与流变,并不是简单的语言传播,而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这在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从中日关于“属国”“自主”的争论和交涉、日本出兵后各国对宗主国的态度等方面,探讨了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前的外交话语权之争,认为日本对西方国际法的认识与活用远胜中国,仅在外交层面,中国已输于日本。

关于日本近代性中的负面因素。东北师范大学周颂伦对日本近代“脱亚入欧”话题进行了新的解读,指出所谓“脱亚入欧”并非同时出现,是先有文明层面的“入欧”,后有政治层面的“脱亚”。南开大学杨栋梁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为核心,认为内藤湖南从日本对华“使命论”等各个方面,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且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内藤湖南的案例留给世人的警示是:学识不等于良知,真正的学者任何时候都应以良知为先,把坚持人类的正义和真理作为“天职”。东北师范大学大田英昭以世界遗产“富冈制丝场”为中心,考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以制丝厂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厂对女工的剥削与压榨,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尤其是日本政府将她们的血汗成果作为换取外汇的手段,并用外汇所得购买武器,转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获得新的市场。

韩国学者姜智恩探讨了韩国的“反殖民地”学术史观的不足,并提出了自己的重塑主张,认为韩国学者为对抗殖民史观而陷入误解韩国经学史的泥沼——“对抗殖民史观之学术扭曲”,犯下了矫枉过正之失,因此韩国“朝鲜儒学创见模式”应以经学论述为核心的表述方式进行史观重塑。

〔作者董灏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